

其志不逝 其业永续
——怀念傅懋昉先生
李宇明

傅懋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，他为我国语言事业、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他的高尚人格和奉献精神受到世人的钦佩。我没有见过傅懋昉先生，但是与先生却有着特殊的缘分。

我同傅懋昉先生有“校友”之缘。

我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、工作了20年，做过文学院的院长和学校的副校长。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是著名的华中大学，傅懋昉先生1943年至1950年在华中大学任教，曾经担任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。傅云起女士2011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篇回忆傅懋昉先生的文章《撒手竟长逝，慈容难再见——思念我亲爱的父亲傅懋昉》，记述了一些傅懋昉先生在华中大学的动人往事。

抗战爆发，原来在武汉的华中大学次第南迁，到桂林，再到云南；抗战胜利后，学校迁回武汉。我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韦卓民先生曾是华中大学的校长，他先后聘请钱基博、蔡尚思、游国恩、阴法鲁、包鹭宾、傅懋昉、王玉哲等一批大家来华中大学执教。傅先生的许多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就是在该校工作期间完成的，如《丽江么些象形文〈古事记〉研究》（武昌华中大学，1948年）等。1948年，傅先生赴英国留学，韦卓民校长在一封给剑桥大学的信中这样评价傅先生：“在我们大学里，傅懋昉在他的年龄就当上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，这是相当不寻常的。在他在任的四年中他做得十分出色。”

傅懋昉先生不仅为学优秀，为人也是有口皆碑。在华中师范大学，时常会听到人们讲述他的一些故事：1948年在“五四”纪念大会上，傅懋昉先生做过这样的讲演：“五四运动使人民知道民主政治的真谛，人民是主人。主人应该起来监督替自己做事的政府官吏，使政治彻底民主，外交真正自主。”“同胞们！把对这时所发生的疑虑与恐惧打消，把传统的愚蠢与贪欲洗刷，我们要以无比的机智与沉毅，及钢铁般的决心，继承五四的精神，使民主的新中国迅速来临。”（《五四在华大》，华中大学“五四”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编）这是多么的慷慨激昂！

1950年，傅懋昉先生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，又回到华中大学继续担任系主任。当时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希望调他到北京工作。罗常培先生对他说，“你要考虑好了，在华中大学你是婆婆，到语言所来你就是当媳妇了。你的级别也要降，你总不能比你的老师丁声树的级别高，也不能和他一样。”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始终都没有同意他调动，只是同意他暂时离开一年。（就此而言，傅懋昉先生应该一直是华中大学的人，因为校长没有同意他调动。）1951年，傅懋昉先生到语言研究所工作，被减掉200多斤小米的工资。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。

我同傅懋昉先生有“同事”之缘。

2000年我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到国家语委工作，国家语委的前身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，傅懋昉先生曾经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委员。1954年10月，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以吴玉章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，直属国务院领导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有23位委员：丁西林、王力、朱学范、吴玉章、吕叔湘、邵力子、季羨林、林汉达、胡乔木、胡愈之、马叙伦、韦恽、陆志韦、傅懋昉、叶恭绰、叶圣陶、叶籁士、董纯才、赵平生、黎锦熙、聂绀弩、魏建功、罗常培。

在此期间，傅懋昉先生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，发表了一些有

影响的文章，为汉语拼音方案贡献了智慧。如《北京话究竟需要多少拼音字母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53年第11期），《拼音文字中的声调问题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55年第9期），《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56年第5期）等论文。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发布以后，傅先生不仅大力宣传，而且将汉语拼音方案贯彻到少数民族创制、改革和选择文字的工作中，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范围，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和文化的发展，被周有光先生誉为“少数民族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将”。

我与傅懋昉先生的“校友”之缘、“同事”之缘，都是高攀的说法。我这样说，是想从华中师大的角度、国家语委的角度纪念傅懋昉先生的贡献，同时也是从这两个角度更真切地感受该如何继承先辈精神、光大先辈的业绩。

逝者人逝，其志不逝，其业永续。如今，当年华中大学同几所大学合并而发展的华中师范大学，已经成为华中、华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师范大学；文字改革委员会也发展为国家语委，工作有新布局，事业有新拓展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，明确提出要“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”，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，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，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。这是我们可以告慰先辈、激励吾侪的！

（作者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）